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萧统

文体辨

昭明文选|昭明文选|萧统|文体辨析|编纂体例|
文体辨析|编纂体例|选录标准|文学思想|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研究

傅刚 著

昭明文选|萧统|文体辨析|编纂体例|选录标准|文学思想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昭明文选》研究

傅 刚 著

导师 曹道衡

审稿 钱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昭明文选》研究/傅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2633-X

I. 昭… II. 傅… III. 昭明文选-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26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7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0.00 元



作者简历

傅 刚 男，1956年5月出生。江苏省睢宁县人。1982年1月毕业于江苏省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7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6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7月出站。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本人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著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文选版本研究》、《萧统评传》（与人合作）、《魏晋风度》等，又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FF74/16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当代《文选》研究的第一部有系统的理论专著。全书以《文选》的编纂及其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既与文学史研究融会贯通，又坚持“选学”研究的鲜明个性。作者在对《文选》编纂背景，如汉魏六朝编撰之目的、动因、体例等考证基础上，详细论定了《文选》的编者、编辑宗旨、体例、选录标准等“文选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同时通过对《文选》的几种主要文体：赋、诗、文的分析，对萧统的文学观作出具体可信的论述。

本书熔宏观理论考察与资料分析考辨于一炉，追根溯源，去伪存真，不尚空论，以同情的理解态度对待研究对象，以考察历史真貌和描述历史事实的发生动因为研究目的，力求使研究结论具有可供进一步检验和论证的科学性。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胡 绳 汝 信

副 主 编：丁伟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伟志 王俊义 王洛林

王家福 方克立 邢贲思

任继愈 汝 信 李 琮

李慎之 何秉孟 张卓元

张海鹏 陆学艺 陈筠泉

林甘泉 郑文林 胡 绳

钱中文 道 布

学术秘书：冯广裕

此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出版说明

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也走上了轨道。几年来，我们已培养了一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是我国社会科学战线上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的博士学位论著，有的发表后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产生了影响。我社过去也出版过几本博士学位论著，受到好评。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改变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青黄不接的状态，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二、文库的选题、审稿和定稿，由《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编辑委员会负责。编委会由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有关专家组成。

三、文库所收博士学位论文，是从已通过学位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论文中选出的（有的论文作者作了增补）。编委会要求这套文库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所收博士学位论文，能代表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因此文库的选稿和出版方针是少而精、宁缺勿滥。文库面向全国征集文稿，从征集来的文稿中加以精选，然后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将长期出版下去。

四、本文库选稿的标准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本学科的重要问题作出创造性研究的；能突破前人结论得出新的

科学结论从而推动了本学科发展的；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学科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当代重大问题作出了开创性研究的。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和风格的论著。所选博士学位论文，应具有严谨的学风，资料的搜集和运用，观点的取得和论证，都应是十分注重其科学性。编委会希望通过这一文库的出版，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中，能倡导一种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哗众取宠的好学风。

五、《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在组织过程中，得到了我国各大学科有关专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我国社会科学博士研究生有关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们的热情支持，我们谨此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希望加强联系，给我们推荐和投寄好书稿。虽然我们力求把这项工作做好，但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和学识水平的限制，在文库的选稿、审稿、编辑、装帧设计以及印制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失误，敬希读者给予批评和帮助。

序

袁行霈

傅刚博士的学位论文即将出版了。这是一篇富有原创性的论文，资料丰富，新见迭出，特别是对于《文选》版本的调查以及版本源流的说明，对《文选》编者的考证，对《文选》体例及其文学观阐释，都能旁征博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篇论文获得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是当之无愧的。关于《文选》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傅刚博士在《文选》研究中所做出的贡献，他的导师曹道衡先生在《序》中已经做了极其精辟的说明，无须我再重复了。

《文选》在唐宋两代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当时的文人们学习写作的范本。到了今天，这方面的作用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将《文选》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切入口，却是很好的选择。套用“《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我们可以说《文选》烂熟之后，以此为学术的基地，纵既可通，横亦可通，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都可以由此生发出来。上下追寻，可以展开对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左右探索，可以旁及史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从选学入手，而不为选学所囿，上下左右开拓发掘，前景是非常宽广的。

傅刚在北大跟我作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有了比较多的了解。他生于徐州，在徐州师范学院得到学士学位；再

到上海师范学院师从曹融南老先生，得到硕士学位；又负笈北上师从曹道衡先生，获得博士学位。曹道衡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是第一位招收选学博士生的导师。正是这两位曹老师为傅刚博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指导他成功地走上研究的道路。而我不过是他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同道而已。《世说》载褚季野与孙安国的对话：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姑且借用这两句未必十分准确的话，傅刚博士可谓兼而得之矣。他是一位勤奋聪慧、研精覃思的学者，有了《文选》这个基地，今后正可纵横驰骋，在广泛的领域内取得一个个新的突破。

傅刚博士嘱我为他的书作序，谨聊书数语以表达我的厚望。

1999年6月16日

序

曹道衡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主持编纂的《文选》一书，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据说曾三次拟作《文选》中的诗文；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告诫过他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到了宋代，此风仍不衰，陆游《老学庵笔记》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连理学家朱熹也认为李白诗好就好在始终学《文选》上。但到了元明以后，人们对《文选》的重视程度就远不如唐宋了。因此“选学”的复兴，实在清代，从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开始，像汪师韩、孙志祖、余萧客、朱珔、梁章钜、胡绍煥、张云璈诸家，在名物、训诂的考释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以致直到今天我们研究《文选》还不能不阅读他们这些著作。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清代的“选学家”，也不可避免地有他们的局限性。例如，何焯等较早的学者，所能见到的《文选》，一般都是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这个版本据不少人考证，说是从“六臣注”本辑出的李善注，并非李注本来面貌。后来胡克家得到了一个南宋尤袤刊李善注本，他组织了顾广圻、彭兆荪等人，把它与明袁褧覆刊宋广都裴氏六家注本和茶陵本（宋赣州刊六臣注本）进行校勘，刊刻了一个新本即“胡刻本”。长期以来，我们阅读《文选》，一般都以这个本子作依据。此外，较常见的就是《四部丛刊》所影印的一个复刊赣州本的六臣注本即所

谓“建州本”。其他版本已很少为人所知，亦少有研究者注意。这种状况，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确有其条件限制，很难求全责备。但时至今日，随着敦煌写本的发现，日本所藏各种古写本、抄本的出现，以及国内外许多版本的公开和影印，的确使我们的眼界大为扩展。例如，北京图书馆藏天圣明道本李善注的出现，证明了清四库馆臣和胡克家等人判断今本李善注《文选》乃辑自“六臣注”之说的谬误。现藏台湾省的宋陈八郎刊“五臣注”及日本所藏高丽旧刊“五臣注”的出现，给我们显示了“五臣注”的原貌，而在此以前，我们对“五臣注”的了解，只有通过“六臣注”。至于许多古写本、古抄本，更使我们了解到李善注和“五臣注”以外唐代其他注家的情况。韩国奎章阁本，展现了最早的“六家注”——秀州本的面貌，而这个“六家注”又基本上最接近于天圣明道本李善注和平昌孟氏本“五臣注”。这些写本、抄本和刻本的出现，使我们对《文选》的一些看法不能不有所变化。例如，历来不少研究者都信从唐李匡义、丘光庭、宋苏轼的观点，尊李善而斥“五臣”。今天看来，这总的评价似乎还不能算错；但在具体论点上，却有待分析。因为在现在流行的版本中，这两种注已被混淆，甚至被李善和“五臣”以外的文字窜乱。这情况其实从何焯开始已有所发现，如班固《两都赋》题下，有一条注，说是李善注，经何焯等人考证，就既非善注，亦非五臣注，而是传抄中误入的。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只有凭研究者的学养和识见，加以鉴别，而有时还难以一一指出，现在有了这许多写本、抄本和刻本作比较，问题就好解决得多。否则也可能尊善注而所推崇的论点不出李善；斥“五臣”而所驳者亦非五臣之言。这是今天的《文选》学研究不同于过去的一大情况。

其次，从清代以来的“《文选》学”，其实是依附于经学的。清人的《文选》学著作所以长于名物训诂之学，其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治“选学”来证“经”；正如有些学者之治各种子书，归根结底是为了训释其中古言古语之义，以为解释“经部”书的旁证。他

们这种工作对“选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是带来了“乾嘉学派”笃实严谨的学风。但正因为“选学家”受了经学的影响，也难免有一定的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例如，清代一些人谈到“五臣注”，就说要“憎而知其善”。然而，像“五臣注”这样的唐人旧注，虽有不少谬误，总的来说不如李善注那样精详，但多少保存一些材料，足资参证，未必需要“憎”它。例如，据周勋初先生依据流传于日本的《文选集证》考证，“五臣注”中有一些注释就直接引自公孙罗注（《〈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见《文选学新论》，中州古籍出版社版第358—369页）。笔者也曾根据“六臣注”本作过一些比勘，发现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中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的不同，往往是李善本同于《汉书》，而“五臣”本同于《史记》。班固《两都赋》的文字，“五臣”与李善不同处又往往同于《后汉书》，其注释亦有采自李贤注者。这说明李匡义在《资暇录》中说“五臣注”尽从李氏注中出一语，未必全合事实。再说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隋代萧该的《文选音》至唐时犹存。萧该是梁鄱阳嗣王萧范子，乃萧统从侄。他是西魏攻克江陵时入北的，如李善所见传自曹宪的《文选》容有不同。生活于开元时代的“五臣”们，也完全可能见到过萧该所传的本子。以目前所知情况而论，“五臣注”比李善注多出一首乐府诗；而在文体分类方面，一些“五臣注”本分三十九类；现今通行的李善注本则只有三十七类，但从清陈景云到近人黄季刚、骆鸿凯先生已经认为应加上“移”一类为三十八类；台湾的游志诚先生又据宋陈八郎本，认为应增“难”一类，而傅刚博士在本书中更根据《郡斋读书志》卷二十证明晁公武所见宋代的李善注本亦有“难”体，当以三十九类为是。这样，三十九类的说法应该说是“信而有征”了。但也还有些研究者仍坚持认为“五臣”注“荒陋”，“又轻改前贤文旨”而表示反对。其实“难”体的存在，已不限于“五臣”本，而坚持三十七类说者所据版本，大抵为“六臣注”或业已证明已

与“五臣”有所混淆的尤刻本而非较近李善原貌的“天圣明道本”（事实上此本已残，无从见其全貌）。其实《文选》的文体分类问题，本可继续讨论。但仅据李匡乂一语，就判断“五臣注”一无可取，同于“五臣注”者均不可信。这是否类似于经学家的门户之见？还有的研究者在论点方面强调对古人有“感情”，这恐怕亦非所宜。因为判断是非的根据归根结底在事实而非“感情”这样主观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傅刚博士在《导言》中提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说，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像目前关于《文选》编者问题的争论，难免使人想起当年陆九渊对王安石和元祐诸公的评论。从出发点来说，双方主张似亦各有其一部分理由，但夹杂着意气，就与真理本当愈辩愈明的通例背道而驰。这个历史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

时至今日，“文选学”的研究已经和前人颇有不同。放在当代研究者面前的任务是既要从新发现的材料和现代科学的文艺观出发，从崭新的角度来看待《文选》，阐明它的体例、性质及价值；另一方面又要继承和发扬前人特别是清代一些学者笃实谨严的传统，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事实证明，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是不太容易的。现在有些研究者凭借其敏锐的感觉，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意见。例如说，《文选》收录作品有详近略远的用意。这在一些文体特别是某些应用文方面，确实有些道理，但在诗，特别是赋方面就不一定是这样。又如有的研究者提到过孔稚珪《北山移文》中“值薪歌于延濞”一句，李善注称“未闻”；而“五臣”吕向注引了苏门先生游于延濞的典故加以解释的事。这确实说明“五臣注”亦有足以补李善注之缺的地方（当然，这条注也可能采自别人如公孙罗、许淹诸人）。但这种个别的例子毕竟还不足以说明“五臣注”的价值可以与李善注相提并论。因为李善注中这类训释的精见毕竟要多得多。所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必须既有作者自己的独到之见，又能掌握丰富而确切的证据，能为多数研究者和读者们所接受。这就有赖于明锐的识见和深厚的功力。这

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当前的学术论著数量虽然不少，但确有价值的却未必很多。在这里，傅刚博士的《〈昭明文选〉研究》一书，有许多优点确实非常突出。

傅刚博士的研究《文选》，首先是从掌握现存各种版本着手的。为此，他跑遍了北京、上海、郑州等地的各大图书馆，克服种种困难查阅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大陆、台湾和国外许多藏本的原件和影印本、复制本，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文选〉版本研究》一书（将另行发表）。对《文选》成书以后，在传钞、刻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进行考察，从而对《文选》及其注本的原貌及流变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对《文选》的编辑宗旨、体例和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论述。

其次，《文选》作为一部从先秦到梁代的诗文总集，它的性质和体例必然要受到当时著述编撰情况、文体分类和总集编纂，以及萧统所生活于其中的齐梁时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状况的制约和影响。为此，傅刚博士对汉魏六朝的众多史籍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掌握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对汉魏六朝著述、编纂的动因、体例和撰人的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考明了文学概念的日渐明确与子、史诸部相区别的由来；并对历代帝王、诸侯的撰述情况进行分析。前者从历史发展上显示《文选》不录子、史诸书的意义；后者从萧绎诸人撰述情况说明帝王、诸侯署名的典籍既非尽出他人之手，亦非尽为自撰，从而对《文选》编者的争论，提出了有力的旁证。至于对《文选》出现以前一些总集的不同体例之考察，更为过去研究者所未经注意，说明了傅刚博士用心之细和用力之勤。

在论及《文选》与《古今诗苑英华》的关系时，傅刚博士详考了《古今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是两部不同的书，并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考出《文章英华》是一部五言诗集，而《古今诗苑英华》则是杂言诗集。比现在某些研究者的推测之辞，显然要可信得多。又如关于《古今诗苑英华》是否即《颜氏

家训·文章》所称的《诗苑》，傅刚博士不仅和目前的研究者一样，以《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唐僧慧净《续古今诗苑英华》为证，还博稽《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诸书，并引用《诗英》、《西府新文》等书作为参证，着重体例的考察，而不仅仅着眼于刘孝绰个人对何逊的态度。这说明了傅刚博士为了论据的科学性，真正做到一丝不苟，对某些具体的考证问题也没有放过。

在考察《文选》和齐梁间一些文学批评著作如《文章缘起》、《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和《诗品》的异同时，傅刚博士既不同意历来人关于《文选》受《文心雕龙》影响的旧说，也不同意今人认为受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新见，而是从南朝文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详尽地比较《文选》与这些著作的异同，指出《文选》的文学观倾向于“新变”，和《文心雕龙》的强调复古不同；又指出《文选》之主张“新变”，又强调“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的要求与萧纲等人有别。在文体分类的问题上，傅刚博士更把《文选》的文体分类与诸书作了比较，证明在这方面，萧统受任昉的《文章缘起》的影响较多。但《文章缘起》一书，在《隋书·经籍志》中作《文章始》，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称唐张彦所补，所以有人曾提出怀疑。但傅刚博士却从宋王得臣《麈史》中证明此书在北宋已有；并且从“五臣”吕向《文选序》注的引文与今本相同证明此书实未尽佚，只是经过了后人的整理。这样的考证，可谓缜密，信而有征。在论证《文选》与《诗品》的关系时，既说明了钟嵘与萧统并无多少交往，而在《诗品》对不少诗人的评价方面，却证明其与《文选》的选录诗歌的情况有许多共同之处，说明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总有其相同或类似之处。这种论证不但确切，也对解决六朝文学史的问题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傅刚博士的研究《文选》，其眼光并不局限于萧统一人、《文选》一书或梁朝一代，而是从整个汉魏六朝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文选》的出现及其历史地位